

孙悟空的原籍可能在福建宝山

王益民^①

(顺昌县博物馆, 福建 顺昌 353200)

摘要:从宝山的地理位置, 宝山的有关考古发现, 宝山的内在相关因素和外在相关人文环境等多角度展开分析, 认为宝山的考古发现, 是孙悟空形象产生于此的重要实物佐证。宝山所处的位置、文化环境、相关场景、民间传说具备孙悟空形象产生的基本条件。宝山周边的人文环境具备孙悟空形象形成的必备条件。从而得出推论, 孙悟空的原籍可能在福建宝山。

关键词: 孙悟空; 原籍; 福建; 宝山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008(2004)03-0030-06

1980年, 日本北海道大学中野美代子教授根据宋代闽文献最早的有关记录, 以及泉州开元寺南宋仁寿塔最早的猴行者形象等研究提出, 孙悟空护送唐三藏西行取经传说源于福建。此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中国学者蔡铁鹰则依据西北党项人以猴为图腾而提出异议, 认为孙行者的故事起源于西北党项人中。而徐晓望先生则指出西北说的明显弱点, 并以大量的理由, 赞同中野美代子教授的观点, 认为孙悟空的原籍在福建^[1]。笔者依据多年来在福建顺昌考古工作中发现的实物佐证, 并结合当地及周边地区的人文环境等进行综合分析, 对徐晓望先生的论述深表钦佩, 并进一步认为孙悟空的原籍在福建顺昌, “生地”为顺昌宝山。兹阐述如下。

一、宝山的考古发现及意义分析

(一)

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山寺大殿就座落在宝山顶峰峰巅。该大殿始建于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近年, 在宝山寺大殿附属文物, 位于宝山顶峰绝顶的南天门后的双圣庙内, 我们考古发现了孙悟空兄弟合葬神墓^[2]。近来, 经进一步发现考证, 南天门、双圣庙为一组仿木砂岩石构古建筑。南天门座西北朝东南。大圣庙相距南天门约2米, 座东南朝西北, 在南天门后门前的低洼处依山势而筑。两建筑背对背, 一大一小, 一高一低平行分布在宝山的最高峰峰尖。南天门建筑面积约120平方米, 建筑主体塌损严重。我们在塌落的古建筑石构

件上, 先期考察发现了下列阴刻纪年铭文: “大明嘉靖二十七年戊申岁六月吉日良时重修”字样。近期又先后在遗址周围发现了早期的石构件及“开山劝首奉承叩谢”和“时大明洪武二十四年岁次辛未八月二十……”等阴刻纪年款, 以及早期构件上的浮雕石佛造像等。据上述纪年文字以及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石构件和宝山寺大殿的始建年代元朝至正二十三年等进行分析考察, 该组建筑应为始建年代不晚于明洪武二十四年的元末明初之建筑。双圣庙建筑面积约18平方米, 原仿木石质庙顶已毁, 现存乃后世改加。庙内孙行者供像(后加)之后, 是一座并立着两通石碑的古代合葬神墓。该墓形制和顺昌当地狮峰寺僧人墓群中明代同期石构古墓相似。墓形呈八字形外撇, 墓宽2.9米, 深1.3米。墓顶是一石制墓首(墓顶石), 呈屋脊状, 中央雕刻葫芦形“脊刹”, 两端“脊吻”大致呈鱼尾状上翘, 长0.76米, 高0.25米。(类似的墓顶石笔者在深入闽东、闽北乡村作国家文物局立项课题《福建北部地区古民居聚落形态研究》调研时在闽北、闽东各地的古墓上多次见有。)墓顶石前并立的两通墓碑间距0.18米。左碑宽0.3米, 高0.8米, 厚0.12米, 半圆弧碑顶, 碑额浮雕一授带法螺法器图案, 法螺呈牛角状。碑文为上方横行阴刻“宝峰”二个楷书小字, 中间竖行阴刻“齐天大圣”四个楷书大字, 大字下端横行阴刻“神位”二个小子, 碑文外框以浮雕如意卷草装饰。右碑宽0.33米, 高0.8米, 碑厚0.11米, 桃尖形碑顶, 碑额浮雕

^① 收稿日期: 2004-04-15

作者简介: 王益民(1962-), 男, 福建建瓯人, 顺昌县人大常委会委员, 顺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顺昌县博物馆馆长, 顺昌县宝山寺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

花卉图案,碑文竖行阴刻“通天大圣”四个楷书大字,大字下端横行阴刻“神位”两个小字,碑文外框以浮雕如意卷草花纹。两通石碑正立在高出地面0.43米的墓台上。双圣合葬神墓是当地民间对所崇拜的神灵人格化的重要实物鉴证。人们依据世间的某些现象创造了神,又把神人格化,民族化,本土化,并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去变化和塑造它,这在我国民间信仰和古代文学作品中已不鲜见。上述两碑“齐天大圣”大家已经熟悉,而“通天大圣”吴承恩版《西游记》里没有。笔者从元末明初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里找到了答案。其中有一段孙行者的自白:“小圣兄弟姊妹五人,大姊骊山老母。二妹巫枝祇圣母,大兄齐天大圣,小圣通天大圣,三弟耍耍三郎。”宝山寺大圣庙的神墓碑是齐天大圣在左,这与古代的礼仪习俗座次以左为尊,以及当地民间习俗中的排序习惯相符。且两通石碑“齐天大圣”碑上方有“宝峰”二字,“通天大圣”碑则略去此二字,弟从兄意便自然不难理解。再从两碑的装饰图案看,“齐天大圣”碑较之“通天大圣”碑亦明显更加丰富讲究。这些都和上述历史文献资料《西游记》杂剧的记述相吻合。该墓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一、它是历史遗存的有关文字资料之外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实物佐证,是研究西游故事主人翁转换和成型的重要实物资料。闽北、闽东、福州乃至福建各地至今保存下来许多祀奉齐天大圣的庙宇、神位,但以其原型“通天大圣”作为膜拜的对象并以墓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古代遗存除此之外便尚未发现别处,且以兄弟合葬神墓的形式存世更是绝无仅有;二、左碑碑额下方“宝峰”二字给我们重要提示:这一个齐天大圣乃宝峰人氏,系宝峰齐天大圣也。这在笔者所在的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宋代名臣余良弼墓神道碑上可见理由,其碑文为“宋经略使龙山余公神道”,龙山乃余良弼的家乡顺昌余坊村后山名。我馆还有一通“皇明邑学士桂岩陈君墓志铭”碑亦可证明。三、按照中华民族传统习惯的落叶归根习俗,生于斯葬于斯。由此推测,宝峰便很可能就是石猴的“出生”地;四、即葬于此,他们必于葬此之前的“有生之年”有相应于激发人们崇敬地选址县境内最高峰并同筑南天门将其兄弟合葬于南天门后之“天堂”里头,使其生得伟大,死得崇高,永恒地得以通天和齐天的丰功伟绩在当地造成足够的影响。且那些足够影响的丰功伟绩至迟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上朔到1368年前的元朝,再上朔到1279年前的宋代在当地民间演绎流传二百多年亦不好说不可能;五、从“通天大圣”乃齐天大圣之原形来分析,该墓早于吴版《西游记》成书时间已很显然。即便按已知的吴承恩生卒资料来分析,亦支持上述观点^[3]。若以目前新发现的明洪武二十四年为期限来分析,此合葬神墓则早于吴老夫子的《西游记》成书

时间近二个世纪。因此说,后来夫子们为刻划人物个性之需把齐天大圣的名号用到了通天大圣头上,且兄弟姊妹的本事都集中到了后来的齐天大圣一人身上,而渐渐埋没通天大圣和其它兄弟姊妹的演变过程,因有此实物佐证,使这件公案变化的时序脉络清晰地突现出来。使宝山成为吴版《西游记》之前的前西游故事的真实场景而不好排除。

(二)

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山寺西北部约一千米处的山狸洞,当地民间相传为宝峰齐天大圣现身于此力镇山精石怪之所,洞内留有古人摩壁石刻的有关文字。笔者为证实这一古文字遗存,曾于2004年1月8日专门进洞考察,爬行至约二百米处,见一2×5米见方的石室,在石室面东南的岩壁中央,我们找到了竖行阴刻的繁体“聖見”二字,“聖”字11×15cm,“見”字10×12cm,两字上下相距4cm。字迹古朴,笔划线条呈中锋笔势。考察观测之余,我们在洞内采集到了十二片瓷器标本,经带回博物馆初步鉴定,这些青白釉瓷片为宋代碗形器碎片。山狸洞文字题刻遗存及洞内瓷器标本的发现,对宝山神猴文化起到重要的佐证作用:一、“聖見”二字题刻的年代早于南天门双圣墓的建筑年代。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特别加按注释:上古没有“现”字,中古也很罕见,凡“出现”的意义在上古都写作“見”^[4]。二、从该洞深处采集的宋代碗形器标本分析,这些器物应有可能系宋代矿工的生活用具。由此推测,至迟宋代已有此洞。因而,宋时便可能存此“聖見”石刻文字。三、该洞之实物遗存及有关传说与上文考古意义分析中的“他们必于葬此之前的‘有生之年’…”应有的丰功伟绩的分析相契合,因而可推想大圣文化在宋元明时期的顺昌曾达到鼎盛程度。四、由此亦可看出,宝山遗存的历史实物资料与当地周边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大致相符,亦验证了当地有关传说的相对可靠性。

二、宝山支持上述实物佐证的内在相关因素阐释

(一)道教名山与道佛合一

早在西晋时期,宝山就曾是一座道教名山。在宝山北向连接干山的山巅一侧,至今基本保存完好的幹仙寮便是西晋太康年间道士陈紫干(干仙)的重要遗存。陈紫干在当时影响极大,至今沿用的地名干山、大干、小干、上千山、下千山皆从其名而得^[5],是当地百姓心目中得道成仙的仙家。当地至今流传干仙在干山炼丹,住宝山幹仙寮修炼得道,在宝山滴水洞羽化升天的传说。幹仙寮为以一片天然巨石为瓦的石室,当地亦称一片瓦,室内主祀五谷神农(五谷仙),配祀水母娘娘,至今香火不绝。门额上方“石瓦”檐边摩崖阴刻的“幹仙寮”三字至今依稀可辨。

宝山除干仙这一道教人物外,还流传着许多八仙等道教故事,以及八仙与孙悟空、哪吒、牛精(牛魔王)等故事和场景。宝山寺由上庵、下庵、半岭庵组成。现存的石庵包括始建于元朝至正二十三年的全国仅见的元代全仿木砂岩石构殿堂建筑,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山寺大殿(下庵),和建于明洪武二十四年的附属文物,仿木全石构建筑南天门及双圣庙(上庵)。宝山寺大殿主祀三济祖师,亦称三佛祖师,为龚志道、刘志达、杨志远,在闽北得道的三位民间俗神⁶。《全像中国三百神》把祖师真人归入道教条目。象这种中国民间本土化了的神僧祖师,其本身就含有道教内容,系佛道相融的产物。大殿两侧稍间敬奉佛教菩萨观音和文殊,为佛教和当地民间信仰合一的殿宇。从其所处的中心位置及目前掌握的建筑年代来分析,宝山寺大殿应为宝山寺早期的主体建筑。时隔二十八年建成南天门和双圣庙,从南天门遗址散落的建筑构件中的石佛造像和浮刻阳文“观世音菩萨”字样及莲花柱础等分析,南天门为佛教殿宇。双圣庙顺势依附在南天门后,内为孙悟空兄弟合葬之神墓。孙悟空这个形象,从民间传说到文献皆能证明其先道后佛,由道向佛,道佛合一的转变历程。他的转变轨迹和佛教重心由中原地区南移,南方地区道佛相融的背景相一致,这也和宝山先道后佛,宝山寺道佛相融的布局契合。这种契合绝非偶然,亦绝非文献和实物作者们的主观臆造,它与当时南方的文化背景相一致。

(二)泗洲与龟山

在《清平山堂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里这样写道:“洞中有一怪,号曰申阳公,乃猢狲精也。弟兄三人,一个是通天大圣,一个是弥天大圣,一个是齐天大圣,小妹便是泗洲圣母……”这里出现了泗洲圣母。在明初的《二郎神锁齐天大圣》杂剧中,齐天大圣上场后自我介绍:“吾神三人,姐妹五个。大哥哥,通天大圣,吾神乃齐天大圣,姐姐是龟山水母,妹子铁色猕猴,兄弟是耍耍三郎。姐姐龟山水母,因水淹了泗洲,损害生灵极多,被释迦如来擒拿住,锁在碧油坛中,不能翻身。”同时出现了龟山和泗洲。无独有偶,笔者在田野考古工作中特别留意到,在宝山西南山脚谟武村边的金溪上,至今还有一处险滩叫泗洲乾,且在泗洲乾附近,至今仍有一座龟山。且当地民间代代相传的与上述水淹泗洲极相类似的故事等,都说明那座龟山的山名至少从宋代沿袭至今。泗洲乾边的山岭上现存大仙庵遗址(毁于文革),据拜访的几位老人人口述大仙庵主祀三位水母娘娘,俗称“泗洲大仙”。这泗洲大仙和泗洲圣母以及龟山水母却相类似,且与水淹泗洲之事有瓜连⁷。而龟山乃宋代理学名臣杨时的家乡。杨时,号龟山,元佑八年(1093年)和游酢同到洛阳拜程颐为师,留下“程

门立雪”千古佳话。其入闽始祖子江公,葬顺昌县城东弥勒献肚山,杨时为入闽杨氏五世祖。葬将乐。顺昌于公元629年以将乐东南两乡置将水场。公元933年由场升县,上述龟山之名至少可上溯到宋代已显而易见。那么文献资料中从龟山水母水淹泗洲到泗洲圣母的转变和宝山下的龟山与泗洲及泗洲大仙、泗洲水母、宝山\仙寮的水母娘娘,以及泗洲大仙(水母)与通天大圣、齐天大圣是否存在内在联系?如果存在相关关系,那么方圆十几里内聚集着孙行者兄弟姐妹及他(她)们的活动场景纯属巧合?

(三)相关环境景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宝山人名的由来民间有几种说法,其一是,宝山孕育石猴宝(宝,当地有婴儿意),因此也称石宝山。再是,很早以前宝山属将乐,那时候人们从将乐的高唐和现在顺昌的武坊方向来看宝山,群峰次第而列,其山形如三宝如来的五指,蕴含大千世界缩影之意。大千世界,万象齐备,应有尽有,因名宝山。而孙悟空总走不出如来佛手掌,其出生地固然就在三宝如来五指之一的宝峰之上。这虽然是民间的说法,但罗列其中的与孙悟空故事相关的场景以及至今仍在当地沿袭相传的民间传说故事,却也着实让人无法排除和忽视它的存在。比如宝峰猿祖岩,该岩整体酷似北京猿人人头,当地相传乃宝峰齐天大圣的祖先;宝峰仙纹石,其石宽广丈许,如台突显于龙背岭的龙口部位,石纹路星裂四射,九窍八孔,极似九宫八卦,且四面更无树木遮阴,每受天真地秀,日月精华,与吴版《西游记》里描写的石猴出生地的那块仙石十分逼近,当地民间传为孕产石猴的仙纹石;神针柱猴王,猴王神形俱备,下巴由定海神针柱托着像是沉思入定,又象在极目眺望;八仙洞(水帘洞),在仙纹石左下方悬崖下端,一字形并列八个深浅不一的岩洞,深者深不可测,内有地下河,当地许多目击者在洞内见有石桌石凳石床等遗物,且洞中有洞,交错芜杂,至今尚未全面开发。洞口长年珠帘不断,洞外涧流清泉甘冽。虽未发现铁板桥,但洞口原系挂有一粗巨铁链可供攀援之用(笔者一九八〇年与多名同学到此,锈蚀的铁链尚存,现已不见),八仙洞外景与吴版《西游记》描述的花果山水帘洞外景甚相衬。其间的溪涧草木,山花树果,猿猴獐鹿,石崖峰洞,松阴竹林之类无不都在八仙洞外的小环境中,实如同出一辙;雷神脚印,相传乃孙悟空大闹天宫后,天兵天将下凡征讨孙悟空时,雷神落地留下的巨型脚印;卧牛石,相传乃牛魔王(牛精)被太白金星和弥勒佛制服后,被水母娘娘点化成石,还原水牛原形长卧宝峰东北侧山岗,看护南天门和双圣庙;还有位于峰顶松林间的练兵场、点将台、猴王靠(仙人床),相传为孙悟空练兵、点将、坐等孩儿们敬献美食的场所……这些密集的场景,以南天门、双圣墓为中心,方圆不

超过一公里。而众多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中,较具代表性和联系特征的如《哪咤查旱灾》、《水牛精恶性不改》、《龙之说》^[8]等。

除上述场景和相关景观外,宝山的名胜景观中,还有很多是以与孙悟空故事有关的神话内容来命名的,如南天门、观音殿、水母娘娘殿、蟠桃峰、猴子拜观音、精灵朝圣、八戒石、石宝峰、雷公脚印、神龟饮光、飞瀑崖、龙脊岭、花果坡、山狸洞、蝙蝠洞、蜘蛛洞、仙人棋盘等,各个景点名称几乎可串成一个猴行者故事。山上有如此密集的相关场景,而山下的几处地名似乎亦能说明问题。在宝山西侧山岭的上山古道途经两村,一个叫马料坑,一个叫土垄。马料坑当地传说乃孙大圣当弼马温时集贮马料圈养御马的地方。而那个土垄,该村原建有高家祠堂,现已毁,留有基址,开基年代不详。至今百分之八十庄户姓高。不知与西游记故事中的高老庄有无关联。在宝山东北侧山岭的上山古道途经一村,村名叫仙场,当地相传乃弼马温放牧仙马的场所。宝山怪石嶙峋,沟谷瀑布众多,原始次生林密布,山上至今仍保存几十平方公里的生态资源管护林,山下万亩竹林环绕,山顶奇岩怪松成片。山上野生猕猴桃、酸枣、山桃、柿子、榛子、米椎、山梨、银杏、葡萄、杨梅、山荔枝等各种野果应有尽有,且各种杜鹃花、百合花、深山含笑等漫山遍野,是野生动物,尤其是猴类动物理想的“花果山”。山上至今还有成群野山猴和狗熊、棕熊、岩羊、飞狐、穿山甲、野兔、獐鹿、野猪等野生动物。由于山猴多得成灾,严重影响山区农作物收成,每隔一段时期,当地山民便须采取相应措施对付。正如徐晓望先生评析“西北说”时指出:大西北的气候与地理都不适合猴类动物生长,西北的茫茫大草原上不可能培育出猴精传说。不论是《取经诗话》还是《西游记》,对风景人情的描写都和南方气候与风俗极为相似,且猴类动物大多生活在南方,因此,孙悟空的故事理应起源于南方。宝山自古多猴,它是孕育猴精故事的理想场所。^[11]

三、宝山外在相关人文环境分析

(一)理学名邦与书院文化

顺昌乃“八闽善地,文献旧邦。”明正德版《顺昌邑志》风俗志载:自宋高峰(廖刚)、槎溪(廖德明)二位先生受业于龟山(杨时)晦庵(朱熹)之门,倡明道学。姚贵淑(姚宝)以论魁胜,流传行于邑,故云:君子重礼义而尚敦庞,小人畏型宪而寡词讼,比屋知学,士风日盛。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的道学先贤杨时与罗从彦、李侗、朱熹并称为延平四贤,与罗从彦、李侗被称为南剑三先生。其祖居顺昌谟武,行止故里,倡道讲学,上接濂洛之传,下开罗、李、考亭之绪,为道南第一人,晦翁(朱熹)、南轩(张拭)、东莱(吕祖谦)皆其出。其门生廖刚以及朱熹的得意门生廖德

明,余大雅皆为顺昌有宋一代道学名臣。朱熹曾先后三次到顺昌讲学访友,并曾在谟布仓山书院讲学。在仓山书院的影响下,顺昌历史上又先后有了双峰书院,二贤书院、华阳书院、文献书院和凤山书院等。五代后梁顺昌便有进士1人,有宋一代顺昌进士38人,其中榜眼1人,举人则有131人。宋代顺昌造就许多留有诗文的学子:廖刚著有《高峰集》、《高峰先生集》二七卷,《诗经讲义》三卷、《大学讲义》一卷,《世彩集》三卷等;廖德明著有《文公语录》、《春秋会要》、《槎溪集》等;余良弼著有《龙山文集》等。且在廖刚的著作中,已有前西游故事相关物事的记录。^[12]宋榜眼姚宝吟咏当地名胜景观的《白龙泉》诗。中的白龙泉美景现今犹在,不知是否为夫子们产生西游故事中白龙马灵感有过瓜连。以上仅顺昌当地而言,而闽北则更加盛况空前。宋代最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在闽北四十年,由于他的努力和影响,加上南平郡守曹修古“独先天下兴州学”,闽北“冠带诗书,翁然大肆,人才之望,遂甲天下。”宋孝宗淳熙时,平均每16户就有一人参加科举考试,仅建宁府参加考试者“亦不下万人”。据台湾学者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统计,宋代闽北有16位宰相,100多位诗人。而宋代婉约派“词宗”柳永,其作品更显示出与前西游传说故事直接的关联:麻姑、蓬莱、金鳌、金母、金龙、上清、玉龟、鹤背、东方朔、蟠桃宴,仿佛悠悠武夷便是天庭仙境,简直已是孙悟空大闹蟠桃宴的原型场景。^[13]凡此种种,皆为培育神猴文化准备和提供了基础性土壤保障,良好的文化氛围使孕育出前西游故事成为可能。与中原文化经闽北这个“文化走廊”发扬光大并传入闽中各地一样,猴文化它孕育生产自“山县多产猴”的闽北,然后再蔓延扩展,向闽中和全国滋生。

(二)图书之府与闽北方言

闽北刻书始于五代,后随着读书应试风气与日盛行,再加上闽北造纸原料丰富,所以刻书业鼎盛于宋元明。宋代建阳麻沙书坊,印刷户达数千户,刻书千余种。刻书,印刷数量均居全国三大印刷中心之首。约在宋元之际建阳书商开始出版小说。刻书业的发达,培养造就了一批出版商兼长篇小说家。现有七种宋元版的小说中,有六种是建阳出版的。从当时出版的能量分析,建阳很可能出过《取经诗话》。^[15]建阳出版的书籍很早就向外出口,在海外很有影响。^[14]近年朝鲜学者发现一部明初的书籍——《朴通事彦解》,其中,朴通事记叙了他所见到的《西游记平话》,该书应出于元明之际。据学者分析,该书已具备西游记故事雏形。徐晓望先生认为,元代建阳出版了一系列的《平话》,《西游记平话》应为其中的产品之一,他的观点值得关注。此外,徐晓望先生认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使用福建方言,应是福

建人的作品。笔者用家乡建瓯、顺昌一带方言对所列例句进行考察亦产生同感。其中的一些语言习惯明显还在当今闽北方言沿用,例如:《入大梵天宫第三》中有“法师曾知两回死处无?”等句尾无字疑问句。这种语法顺昌当地及周边的建瓯、将乐、延平土语中至今保留。其它如“寺中都无一人”;“借汝威光,同往赴斋否?”;“我将为无人会使此法”;“虽有虎狼虫兽,见人全不伤残”;“次日入一园,都无一人”;“至今由怕”;“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这些文句,正是典型的当地土话,笔者用土语对照朗读,十分契合顺畅。由此看来,该书作者应有在闽北语境的生活经历。

(三)动物精灵崇拜与当地猴文化环境

许慎《说文解字》称:“闽,东南越,蛇种”。《太平御览》载:“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种。”闽北武夷山城村闽越王城遗址出土的瓦当图案上,很多有蛇的纹样,出土的铜铎也装饰着极象的蝮蛇纹。青蛙也是闽北人崇拜的动物,闽北人看到金线蛙,常奉烧酒供养,为金线蛙演戏奏乐。邵武市还有人为蛙神设簿册,专门记载蛙神显灵事迹。^[17]此外,闽北的动物崇拜还有猫、狗、猴等。^[18]猴崇拜可能源自闽北各地的“五通神”崇拜。“五通神”也称“五通鬼”,实际上就是居于南方深山之中的山精石怪。^[19]南平溪源庵的萧公故事中,就有关于萧公等五公斗胜五通鬼的传说。^[20]其后五公中的刘公“迨至唐会昌三年(843年),顺昌猛虎横行,妖龙妄动,圣君以诏布告十方。刘君以得给领文诏,力显神通,降伏二孽,临时乘龙跨虎腾云而入七台。是时,圣主武宗即封刘氏为‘普照真济正刘公大师’”。^[21]顺昌大千七台庙至今祀奉刘公神位。五通神各地有所指,杨澜的《临汀汇考》记载:“考韦昭注国语,木石之怪曰:夔、魍魎。木石,谓山也。夔一足…人面猴身…越中有之,不独汀也。”在商周青铜器上,有一种神秘的兽纹叫作“夔”,许慎《说文解字》析“夔”字:“夔,贪兽也,一曰母猴。”段玉载解释:“母猴与沐猴、猕猴一语之转。”古人把夔视为精灵等于把沐猴、猕猴视为一种精灵。由此可见,五通神的山精木怪中应有猴类动物精灵成份。闽北的五通神崇拜可上溯到唐代以前,上述刘公等便是佐证。在闽北、猴精崇拜显

得特别突出,猴文化现象在顺昌周边县市至今普遍存在,仅顺昌县境内现今就还存在多处猴精崇拜的遗存。顺昌洋口天台山有一处“通天大圣仁济真君”神庙,庙虽后代重建,旧碑铭上的阴刻文字“大明万历十二年□月十三吉旦”年款和阴刻“通天大圣仁济真君”字样都仍依然可辨。天台山亦有一座仿木石构庙宇,建于明洪武九年(1376年),与宝山寺大殿大致为同期建筑,但规模较小。顺昌民间相传:“衢山头、宝山腰、天台山脚”,三山同期都建有仿木石构建筑,主祀三济祖师,配祀通(齐)天大圣。笔者因此专程前往将乐县衢山和顺昌天台山考察,从现存遗迹中发现民间所传基本属实。顺昌郑坊乡、大历镇、建西镇、高阳乡、水南镇至今保存敬奉通天大圣、齐天大圣的坛庙。据老年人回忆,顺昌双溪镇(城关)电信局旧址,原建有通天大圣、齐天大圣双圣庙,每年古历正月十五日,该庙要从宝山双圣庙接引圣火,在庙坪举行过火焰山仪式。顺昌周边的南平茫荡山三千八百坎以及南平宝珠村亦存有齐天大圣庙,乡人称孙大圣石公公。南平延平区樟湖镇,一镇之内有三座孙悟空庙:钟灵庵、聚灵庵、显灵庵(22)。而以通天大圣名号出现仅在顺昌见到,且有明确纪年和文字可考,实属罕见难得,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 [1] 徐晓望.福建民间信仰源流[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
- [2] 王益民.孙悟空兄弟合葬于此[J].炎黄纵横,2002(5).
- [3] 王益民.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实物佐证[J].武夷文化研究,2002(2).
- [4] 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5] 马性鲁.顺昌邑志[M].明正德庚辰版.
- [6] 王文泰.闽国史汇[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 [7] [南宋].赵汝适.诸蕃志[M].
- [8] 施鸿保.闽杂记:卷五[M].
- [9] 罗小平.闽北与台湾文化习俗[M].海风出版社,2001.
- [10] [宋]洪迈.夷坚志:卷十九[M].
- [11] 摘自林蔚起.古井·古村·古庙[J].武夷文化研究,2000(7)

【责任编辑 戚增强】